

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澳門賭場荷官的矛盾體驗

史唯、劉世鼎

澳門大學傳播系

論文發表於

2010 年台灣文化研究年會（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

1 月 9-10 日，台南成功大學

本文將透過對澳門博彩業的主要勞動力荷官的研究，探討新自由主義下主體性的問題。有學者指出七十年代末以來，資本主義逐漸成為賭博式的經濟，脫離傳統的工廠製造業生產勞動領域，轉向投機的金融市場投資來尋求高風險但驚人的獲利，愈來愈不受到具體勞動道德經濟和成本的局限，而博彩業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徵候和象徵。¹ 澳門脫離殖民地的歷史經歷諷刺地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徵。葡國殖民晚期，當傳統的工廠製造業生產線轉移到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後，賭博業成為這個前葡萄牙殖民地生產價值的主要途徑，開始轉向依賴投機賺快錢的發展模式，靠機會來積累財富。這種賭博經濟模式為後來的新自由化的激進經濟改革提供了基礎。回歸後澳門政府所追逐的放任式的、以增長的意識形態為導向的經濟政策，結束了原本由單一財團所壟斷的局面，讓投機的、不受規範的跨國賭博資本移入尋求獲利。在新的治理模式下，經濟利益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主要標準，賭博所帶來的社會風險被理性化、資本化、市場化，並且被轉嫁到個體身上。隨着經濟領域向一般社會、政治領域擴張，新的權力—知識關係和主體生產模式也開始浮現。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殖民形式的終結後變得尤為顯著。

然而，主體性從來不是經濟的直接反映。新自由主義不只是新的資本積累方式和生產關係，也不是簡單的意識形態操控的結果，因此純粹的經濟分析也無法

¹ Comaroff, J. and Comaroff, J. L. 2000. "Millennial Capitalism: First Thoughts on a Second Coming", *Public Culture* 12 (2).

幫助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是如何透過社會主體的領域，例如主體的日常生活體驗和自我實踐來，達到有效的統治。² 本文將以澳門荷官為研究對象來探討回歸十年，特別是 2002 年澳門賭權開放和博彩業擴張所造成的社會脫臼對於澳門主體生產所造成的矛盾。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自從賭權開放、澳門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體系之後的主體化問題，市場提供的「自由」如何構成新的支配形式，以及主體的自我選擇、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如何被主體所內化並帶給他們解放的感覺。我們的焦點是：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在焦慮、期盼、欲望的主體領域內運作？要瞭解這個過程，我們先從澳門結束了形式的殖民統治後，博彩市場的結構性轉變說起。

賭博資本主義的擴張

如同 Robert Young 所觀察的，第三世界殖民統治的結束，往往伴隨著被殖民者對於「發展」與「現代化」的強烈渴望。³ 在澳門，這樣的渴望就表現在剛剛上任后的特區政府所推行的賭權開放政策上。特區政府將賭權開放建構成是將澳門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並搖身一變為國際大都會的「轉型機遇」。

長期以來博彩業一直是澳門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早在 1847 年，殖民政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開始正式承認賭博合法化，將其視為是一種特殊的合法商業貿易。儘管 1896 年澳葡政府宣佈禁賭，但澳門的博彩業並沒有就此停止或者消失，而是轉為地下經營，默默支撐著澳門的經濟。1961 年，澳葡政府重新頒佈法令特許博彩業「作為一種特殊娛樂事業」在澳門經營，博彩業再次成為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命脈。⁴ 儘管博彩業的主導地位在八十年代中期曾一度讓位於加工出口業，但博彩業所創造的生產總值一直居於領先的地位。1962 年何鴻燊等

² Read, J. 2009. "A genealogy homo-economicus: Neolibe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Foucault Studies* No. 6.

³ Young, R. J. C. 2001.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 44.

⁴ 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香港富商所組成的澳門旅遊娛樂公司取代了原來的香港泰興公司，獲得了賭業專營權，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的完全壟斷經營。⁵ 然而由於整個公共資源長期向賭博業傾斜、加上政府對賭場利益分配問題所導致社會治安惡化束手無策，賭博文化終未能獲得廣大市民的認可。特別是臨近回歸的時候，澳葡政府對於賭場經營採取放任的政策，使得黑幫為爭奪賭場邊際利益而引發的衝突、綁架、廝殺和組織犯罪等層出不窮，澳門經濟蕭條，社會治安混亂，這使得民衆對於回歸產生高度期盼，也使得新政府致力於博彩市場的結構性調整的舉措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同。

6

在尋求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特區政府巧妙地抓住澳門居民想當家作主與盼望建設「新澳門」的心理，把澳門推入世界市場。第一任特首何厚鏵一再強調創造條件吸引投資、並「注意如何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周邊地區的發展中使自己獲益」。⁷ 作為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的考量，打破澳門賭博專營權，開放賭權公開競投從回歸後一開始就被納入一種可行性的選擇。雖然何鴻燊本人多次公開發表反對意見，但由於澳門人普遍不認同市場完全壟斷，因此官方所主張透過改革賭權，引入外資競爭來改善澳門經濟結構的意見明顯占了上風。2000年12月，在澳門回歸一週年之際，何厚鏵赴北京述職，明確地陳述要以「打破壟斷、市場競爭」地原則來放寬國際（主要是美國）資本注入澳門賭業的限制，打破博彩專營權的局面，這樣的改革思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肯定與支持。⁸ 在這樣一個主流意見氣氛下，雖然何鴻燊一再倡議開放賭權應僅限於澳門人，特首堅持學習美國賭城的發牌與管理制度，並將賭權優先讓給「具有國際水準」的經營者。

2001年7月，澳門政府在特首的主導下通過了開放賭權條例草案，確定將

⁵ 1987年正當中葡雙方正在談判澳門歸屬問題、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之際，澳葡當局在未徵詢中方同意的情況下特許澳門娛樂公司的賭博專營權延長至2001年，引發北京當局及澳門親中社團的不滿。

⁶ 本節討論截取自：劉世鼎，2007，〈澳門的新殖民主義：透視2007年五一大遊行〉，《思想》，第七期，p. 55-82。

⁷ 引自〈澳門賭權將會開放 何厚鏵強調嚴格監管 現況將維持一段時間〉，《大公報》，1999年12月2日。

⁸ 這樣的一個改革思路被看成是澳門的“改革開放”。一位記者朋友稱澳門的「改革開放」比中國大陸晚了至少二十年。

發出 3 張賭牌、規定新的賭牌可以由非澳門人獲得，一時間包括美國、澳洲、香港和臺灣在內的 21 個財團與博彩經營者紛紛加入競投。2002 年 2 月 8 日特區政府正式宣佈審查結果，將賭博業經營權批給三家公司，分別是美資永利渡假村，港商呂志和家族和美國威尼斯人所合營的銀河娛樂場，以及何鴻燊所持有的澳門博彩公司（簡稱「澳博」）。隨後，三張賭牌又裂變為六。威尼斯人與銀河集團分開經營，永利將賭牌自行拆分給何鴻燊兒子何猶龍與澳洲 PBL 集團的合資公司，美國美高梅集團則於 2004 年與何鴻燊女兒何超瓊達成私人協議，以兩億美元購入澳博所拆分的賭權，至此，澳門賭博業市場長期完全壟斷的局面從此宣告徹底結束。

為了急速地進入國際市場，融入全球資本的遊戲，回歸後的特區政府與跨國資本聯合打造的帶有強烈新自由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色彩的發展策略則顯得深入而具體。為了配合澳門博彩業的急速發展，政府在社會輿論上有意識地迎合跨國博彩公司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主要表現在政府有意識地將博彩蓄積資本的方式合理化與合法化，博彩與投資的界限變得非常的模糊，形式的經濟增長和繁榮成為市場行為和價值評估的主要準則。社會的財富分配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以合法化的博彩為核心。在這個政府與博彩企業共謀的權力結構中，為跨國賭業集團提供盡可能多的優惠政策，以改革的名義對賭業集團放權讓利。早在賭權開放之初，政府就投資數千萬元設立博彩業培訓中心，免費為美國公司培訓工作人員，並將澳門有限的土地資源分配大幅度地向博彩業傾斜。凡涉及賭業合同的土地項目均可豁免公開競投，並以遠低於市價的標準批給博彩業。例如為了滿足總投資額達到 120 億美元、1.3 公里長的威尼斯人集團「金光大道」開發案的龐大土地需求，澳門政府在路氹區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地供其使用；氹仔軍營對面一塊 44 萬平方米的土地按公開競投的土地價格計算價值 300 億，最後卻以不到 30 億的價格批給銀河娛樂公司。⁹ 不僅如此，特區政府也默許博彩企業

⁹ 政府這一做法引起社會的普遍質疑。政府曾一再表示澳門土地稀少、找不到合適的地點興建更多公共房屋供應基層市民，另一方面卻賤賣大量土地為財團謀取最大利益，引發民間團體合部分

無限制地向社會各個領域和空間擴張，各式主題賭博場所如雨後春筍般落成。賭場、角子機店和運動賭博投注站「遍地開花」，擴散到各個居民社區，賭博已經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博彩的膨脹使得澳門在 2006 年博彩收入總值達 72 億美元，首次超過拉斯維加斯，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博彩中心。

外資的流入，被看成是幫助澳門「與國際接軌」，使之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娛樂博彩中心。美資賭場的形象和地位明顯高於傳統賭場，美式的經營模式被看成是「現代化」、「先進」的典範。¹⁰ 現代博彩業鼓吹休閒消費主義，傳遞的是投機主義、佔有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媒體、廣告、公關公司和官員合力推廣一套融合了追求財富的渴望、強調消費者自主性和享樂主義的景觀和語言，有關拉斯維加斯富翁成長經歷和成功故事的美化報導有效地將結構性問題簡化為個人聰明才智的區別、從而掩蓋了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相較於過去葡京壟斷時代給人的「罪惡之城」、「豪賭」的負面都市形象，強調娛樂休閒、度假觀光正面形象的美資賭場進入澳門之後，確實讓年輕人對賭博業產生相當正面的觀感和吸引力。美資企業投下巨資營造賭場和酒店豪華氣派的風格，推銷酒店炫麗的夜景、煙火秀和美食餐廳，舉辦大型商業展覽、國際體育明星表演賽、知名歌手演唱會和歌舞表演，邀請影視明星作代言人，將賭場包裝成光鮮亮麗的、體面的娛樂休閒度假場所。仿照拉斯維加斯賭城風格設計的大型購物中心和人造運河，更改寫了賭場在人們心目中的負面形象，成為一家大小休閒的去處。而于 2009 年最新落成的「新濠天地」，其英文名稱 City of Dreams 更是直接彰顯了夢想之城的含義，把賭場建構成實現和體驗夢想的地方。澳門新青年協會於 2006 年中所公布的《博彩業發展新時期澳門青年的價值取向》指出，多數受訪問的青年認同博彩業是正當娛樂行業，顯示和老一輩對賭業的負面觀感有很大的落差。老一輩的節儉、勤奮、自律等傳統道德觀，難以抵擋年輕一代所熱烈擁抱的佔有式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後者構成了使新自由主義順暢運作的必要元素。年青一代的自我認同的建

議員的強烈抗議。

¹⁰ <賭權開放鑄十年輝煌成就>，《澳門日報》，2009/7/15。

構與自我解放的願望和官方與國際資本共同打造的絢麗的博彩景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自由」作為新的支配形式

在其《生命政治的誕生》中，Michel Foucault敏銳地區分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主體建構上的不同。和既往的主體生產模式不同的是，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建構更多的強調的是主體「自我管制」(self-governmentality)和自我規訓。在Foucault看來，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個體被建構成「固定資本」，即主體的建構往往是依照規訓和標準化的權力模式，主體的智慧和技能被嵌入到機器的運作中，主體是權力的、技術的產物。然而在新自由主義階段的主體建構中，國家政府積極保護市場競爭的條件，個體被建構成「人力資本」，主體的建構邏輯傾向於培養個體的溝通能力和社會關係。也就是說，資本不再僅止於剝削勞動力，而是通過創造和溝通的能力來穿透社會關係，主體的建構是自我技術的產物。¹¹這種新的管制方式從工廠的集中化規訓變成分散的、彈性的、開放的控制，強調個人自由、風險、權力、責任、角色的新的接合，個人被建構為要主動承擔就學、就業、選擇和責任的各種風險，並努力開發自己的潛力。

這種新的管制技術代表著新形式的權力和主體接合，擴展了經濟理性的範疇，將競爭意識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個體被形塑為為自己的行為和選擇負責，並將所有可能的風險和後果「自然化」為實現個人自由必要的代價。從這個角度來看，原本屬於政府和國家的領域被「個體化」，交由個人自我負責，即問題的解決方式落在發展個人的倫理方面。個體需要表現得理性、積極、能夠自由選擇、自我管理、自我創造、自我約束，同時自由選擇的權力和自主性成為建構主體的核心。個體有義務通過自己的選擇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在這種新的‘自我觀照’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了如指掌，將自己的人力資本發揮到最大的

¹¹ Foucault, M.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限度」。¹² 這也意味着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將主體的潛能、傳播溝通能力、思考創造能力、感受能力轉化為生產力的新的階段，主體的建構不僅僅是由國家和經濟決定的，而是個體的自我管制，是個體將規訓與常規化內化為自我的一種表現。¹³

結合到澳門的語境來理解，政府和企業所強力推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是沒有效果，個體的「自我管理」的技術很明顯的表現在對於政府和博彩企業所共同描繪的博彩事業的承認、認同與投入上。就荷官這項特殊的工作而言，其角色功能如同整個賭場機器的一個環節，其工作性質屬於非物質性或所謂情感的勞動，¹⁴ 勞動過程所生產的不是具體的貨品，而是一套人際服務以及客戶關係的維繫，主要職責是發牌（俗稱「派牌」）。他們每天經手大筆的金額，擔負極大的風險。荷官的訓練內容完全是根據賭場內不同的玩法來設計的，內容包括派牌技巧、賠率計算技巧、手勢以及應對賭客的技巧，並且要熟悉「百家樂」、「poker 牌」、「black jack」、「骰仔」和「輪盤」等不同賭博玩法。要成為一名荷官，在接受三個月的密集訓練後，便可上賭桌發牌，這類工作容易被取代。除了發牌技巧外，課程還包括了客戶服務技巧、人際溝通能力等。

在我們的調查中，在被問及是否自願選擇荷官這個職業時，只有少部分人認為是為了分擔家里的生活壓力，而有九成五多的受訪者坦言自己選擇荷官是自覺自願的，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外界的壓力和干擾，他們擇業的過程具有很高的自主性。

家人都好贊成做荷官，因為人工高。看報紙，聽媽咪說巴比倫（澳門一家賭場）請人（招聘）后，自己去填表申請。（小美，22歲，現為永利VIP廳荷官）

¹² Fraser, N. 2003. "From discipline to flexibilization? Reading Foucaul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onstellations* 10 (2), p. 168.

¹³ Read, J. 2009. "A genealogy homo-economicus", p. 27.

¹⁴ Hardt, M. and Negri, A. 2004.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p. 108-115.

我高三畢業沒有多久就投身賭場，大學入學考試也沒有考，我的家人也非常贊成，因為我已經 22 歲才高中畢業，家人覺得我已經到了踏入社會工作的年齡，所以不贊成我升讀大學，我的哥哥也是一名荷官。(Mini, 22 歲，法老王娛樂場荷官)

當時只見時勢好，某賭場又將開幕，所以想試試；都沒受什麼人影響，而且家人又都沒有反對，而且如果我到賭場工作會令家人生活好些。(陳小姐，24 歲，永利 Gaming supervisor)

看報紙填表格申請入職，沒有受任何人的影響，只因為人工高，福利好。(阿豪，23 歲，皇家金堡荷官)

在澳門，澳門政府和博彩企業為了讓荷官的職業更具有誘惑力，以吸引更多的勞動力「自覺自願」地加入，在政策上提供一系列的激勵措施以使得博彩業具備其他行業所不具備的優勢和優惠。這樣的一些措施包括，荷官的入職年齡設限偏低，只要是年滿 18 歲的澳門公民都可以申請。¹⁵ 這樣的年齡要求，意味著對於絕大多數的澳門青少年來說，只要初中畢業就可以直接投身到博彩行業中，而不需要完成更高的學歷；其次，荷官的薪水遠高於其他的行業，即使是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剛剛新入職的底薪也達到 8000 元澳門幣，¹⁶ 而這還是與澳門居民的人均收入相等，¹⁷ 更不用說在博彩業繁榮期，荷官的入職起薪一般在一萬五左右，還不包括小費，這樣的收入是其他行業收入的兩到三倍。再者，澳門政府規定澳門的博彩企業只能聘用本地人做荷官，這使得大量的外來勞工與荷官的

¹⁵ 2007 年 11 月 14 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鏞在立法會的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上強調，政府考慮將澳門荷官的入職年齡由 18 歲提昇到 21 歲，已經在賭場工作的未滿 21 歲的人士，可安排三年的過度期，以回應社會對賭場入職年齡低的質疑。

¹⁶ 見注 30。

¹⁷ 2009 年第一季度澳門的人均收入為 8600 元（澳門幣）。見〈賭權開放鑄十年輝煌成就〉，《澳門日報》，2009/7/15。

職位無關，同時減少了本地荷官的競爭壓力。

為了滿足眾多的年輕人能夠「自覺自願」的投身到博彩的行業（更主要的是為了博彩企業提供足夠的勞動力），特區政府還在 2003 年起開始，資助理工學院和旅遊學院成立了旅遊博彩技術培訓中心，或支持民間組織舉辦的各種博彩培訓課程。就連原本以主辦康樂團體活動為主的社區活動中心，也被立法會議員要求納入新的生產體系，被賦予培育新勞動力、配合新的市場運作需求的任務（如職業登記、協助育嬰等）。民間的成人教育團體開始服務新的企業需求，從原本的政府公共財物的管理人轉變成為新資本利益的代理人。荷官的技能訓練與傳統社群脫離，轉而由企業的代理人所提供。

這樣的一些優惠措施和誘惑使得那些年齡小、學歷低、薪水不高的人對於荷官的職業趨之若鶩。在賭權開放後的兩三年內，警員、空姐、銀行職員、中小學教師等紛紛轉行，尤其是那些在校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在博彩業擴張最劇烈的時期，學生有書不讀等派牌的現象比比皆是，成為媒體相繼關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教育部門曾經對 2003 年到 2004 年的輟學學子進行調研，結果發現該年度共有 4908 位學生離校，其中 2060 人選擇就業，76% 投身到博彩與相關的服務行業。

將近有一半的受訪荷官表示，如果沒有高薪的誘惑，或者提高學歷的要求和博彩從業人員的年齡，開放外勞市場的競爭，他們可能不會考慮將荷官這份職業作為首選，亦即其「自覺自願」的程度會打折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荷官所呈現出來的自由選擇、自我管理的自主性從一開始就是政府與博彩企業共謀關係的結果，是兩者所共同建構和營造的服務於新的權力結構關係的產物。荷官的身體被新的權力關係從過去的家庭和學校中解放出來，根據新的博彩市場的需要而專殊化，而這一切都是通過賦予個人自主性的方式（如自由擇業、滿足經濟的自我利益等）來對個體進行支配。這正如一位學者所觀察的，「主體往往是根據一些看似理性和合理的真理或知識而被管理和控制的。在這個意義上，主體性並不是真正地獲得自由或者下意識地表現出真正的內在的自我。我們只是被引導著去

思考我們自己，由此以為我們找到了表現自我的正確方式。」¹⁸

形式的自由

消費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一種徵候，即個體被建構成是消費的動物以適應通過刺激消費來快速積累資本的運作邏輯。¹⁹ 而在晚期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這種主體建構模式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灌輸，而已經是一套非常有效的社會關係的實踐和社會真實狀態。²⁰ 當被我們問到在「什麼時候自己最放鬆」，或者「怎樣才覺得自己活得才是真正的自己」這類的問題時，絕大多數人回答的是「購物消費」、「和朋友吃飯唱K」，也有人認為是吸毒和賭博。

初入行的時候薪金大約一萬三，在同行里算是十分高，現在的薪金是兩萬。賺的錢多了，花費的也多了，而且還比以前豪爽。放假經常都會出外買化妝品和衣服，每月大概會用六七千左右，還未算外出吃飯等的消費。我還算好的了，不會像有些同事購買名牌，他們每出新款就會去買，幾千到一萬都在所不惜。（陳小姐，24歲，永利賭場 supervisor）

我的錢通常用在食和穿方面，雖然正常是一日三餐，但是我們一日也不知道有多少餐吃。有時有空又食，宵夜又食，一大班人去食東西，每人至少一百，一星期食足六餐，都六百元。有數得計，如果去唱K，一人至少兩百元。（Mini，22歲，法老皇荷官）

名牌衣服是必要的。除此之外，我的其他日常用品也都是名牌的，包括香水、鞋、袋、首飾等等，……我女朋友也是買名牌的人，她以前是在沙沙[化妝品店]做

¹⁸ Mansfield, N. 2000. *Subjectivity*, New York: NYU Press, p.10.

¹⁹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²⁰ Read, "A genealogy homo-economicus."

事，現在做公關，她比我更厲害，化妝品、公仔、首飾一大堆。（阿豪，23歲，皇家金堡荷官）

在這裏，建立在釋放自己、滿足自己的基礎上的消費成了荷官們自我實現、自我創造、自我選擇，或如Foucault所說的「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self）的另一種最直接的體現。對於很多荷官來說，消費和購物是一種不知不覺又必不可少的自我表現，往往通過對於物品的選擇和占有來證明、展示自己的自由和存在。這也正如Bauman對歐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化過程所做的觀察一樣，置身於被商品籠罩的個體，「其對於消費的依賴——這一共通的對於購物的依賴的特質——是所有個體展現自由的必要條件，尤其是體現個體差異的自由，展現認同的必要條件。」²¹ 借用Zizek的說法，這種建立在對於消費社會所提供的商品的選擇之上的自由只不過是「形式的自由」，必須和能夠超越現狀、改變既有秩序和遊戲規則的真正主體自由有所區分。²² 在一個壓抑對實質自由追求的氛圍中，個體對於消費這種展示自由的方式也產生一種幻覺式的依賴。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消費的重點已經不是消費這種行為本身，而是慾望的展示，消費的行為來自於要不斷地滿足新的自我實現的慾望，「當今社會的消費不再是為了滿足某種需要……人們認為消費活動的動力不再是一些可以測量和把握的實際的需要，而是慾望——一個比需要更飄忽不定、轉瞬即逝、變幻莫測和本質上難以把握的存在，一種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原因而自行產生和自我激勵的動力。儘管慾望會層出不窮而且維持的時間不長，但是慾望總是不斷地有新的目標，也正因如此，慾望總是難以滿足的。」²³

²¹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83.

²² Zizek, S. 2001, *On Belief*, London: Routledge, pp. 113-122.

²³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pp. 74-5.

風險的轉嫁

可是，把慾望看成是自由和自主性，或是通過佔有商品來實現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的動力，並不是沒有問題的。這主要是因為在實際的生活實踐中，很難區分自我實現、自我滿足與自我放縱之間的慾望的差別。換言之，在所謂合理的、正常的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與破壞性的自我放縱之間很可能是一線之隔。就澳門荷官而言，消費行為所體現的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本身並沒有好壞可言，花錢買名牌衣服、手袋、化妝品與唱 K、縱慾、買毒品之間並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如同一位荷官所直言的，「錢是我的，我想怎樣花是我的自由。」在很多荷官的心目中，吸毒、唱 K 與發生性關係是聯繫在一起的，其間並沒有一個嚴格的道德邊界。

好喜歡去唱 K，情到濃時會即場與異性發生關係，其他同伴會用手機拍下過程，互相傳送作為閑話家常。（小美，阿 M）

我的朋友 Kevin 和小如，小如經常對 Kevin 獻殷勤，有次唱 K 后，女方要求在男方家過夜，理由為無家可歸，Kevin 有個朋友醉酒后答應了，回家后男的睡在房間里，女的睡在廳里；深夜女方潛入男方的房中發生性行為，事后女方致電 Kevin 要求負責，Kevin 朋友醒后不知道發生任何事，女方回公司把性事張揚開去，由華都(澳門一賭場)傳到其他賭場。（不願透露姓名的荷官）

染上毒癮的荷官多半會過關到大陸城市（如珠海、深圳）購買毒品或吸毒，因為價格便宜、隱蔽性高。

基本上大多數人都會出大陸玩的士高[disco]，大家飲酒、跳舞，男的就溝女，女的就溝仔。通常去大陸玩的目的是只有一個，就是「high 野」，即「索 K」、「啪丸」。

但我不會「high 野」，只是觀看他們 high，有時看到他們感到很好笑，當他們「索 K」後，就像「傻仔」一樣。雖然吸毒犯法，但是大陸的的士高是不會理會的。一進去簡直就是毒品天堂，每一間都有毒品。如果那裏的負責人去理會，就是和自己公司作對。有些朋友會認識那些毒販，約定在的士高附近的地方交易。想要 K 和丸的數量要在打電話叫對方來的時候說明清楚，然後交易完就拿回房間分派，這叫做「開飯」。首先要準備水果盤，因為要把 K 倒在碟子上，然後弄碎，準備吸管吸進鼻子裏。像這些場面[我早已經]見怪不怪，就像看戲。有些人[吸完之後]就完全呆坐在那兒，有些就脫衣跳舞。上網也有很多這類短片。有些男的溝到女的後就立刻到廁所作愛，這些稱為「太空戰事」。(不願透露姓名的荷官)

在我們所接觸到的荷官中，大概有一成的荷官都不同程度地接觸過毒品，而且吸毒的主要理由大多是由於工作壓力太大，毒品可以幫助「減壓」，也有的表示只是想尋找刺激。這樣的心態看上去和其他大多數吸毒者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如果結合澳門的語境來看，這樣的尋求刺激和自我縱慾與新自由主義所宣傳的個人要努力承擔風險、接受不確定性的意識形態是分不開的，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的主體的建構中，對於社會風險的承擔被合理化，並被簡單而巧妙地嫁接到的尋求刺激的嘗試中。²⁴

如同對吸毒採取一種無所謂的去道德化的態度，很多荷官也坦言自己賭博，而且並不認為喜歡賭博應該有罪惡感，反而很自然地認同政府和企業所建構的博彩只是一種個人的娛樂和休閒，與其他的娛樂形式並沒有本質的區別的論述。由於荷官直接接觸金錢遊戲，且作息時間不固定，生活圈子小，有些人下班後沒處可去，賭場很自然而然地成為另一個去處，成為他們慾望表達的一個場域，

花費太大，有賭，一個月 4, 5 次，每次投注百多元，最高一次輸一千多，家人

²⁴ 相關討論見：Cosgrave, J. F. (ed.). 2006. *The Sociology of Risk and Gambling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特別是編者的導論。

不贊成。

賭場渲染力好大，賺大花大，花完再賺，借卡數很多。——開始不賭到最后還是賭，每個都賭，最高8萬上下，自己人賭，賭波50萬一場，最多有人輸幾十萬，心態都是博一博，他們認為自己有很大的能力去償還。

賭博往往被荷官看成是對於刻板枯燥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改變，以及挑戰自我的嘗試。染上賭癮的荷官，經常向同事親友借錢或借高利貸賭博。

我開始每次投注五百到一千元的金額，最後愈陷愈深，累計共輸掉八萬元。如果我當時沒有賭博，或許我可以將那八萬拿去買樓、供首期，那麼現在我就可以有自己的物業了。（小周）

澳博曾經有荷官跳樓，因為家境貧窮，每月家用為一萬，要供細佬讀書，有次同人去賭，輸左一萬，交不了家用，竟想不開去跳樓自殺，上過報紙。」（祖）

花錢多了，身邊好多荷官都會去‘把’[賭錢]，有些會輸掉全部人工，四處問人借錢。曾經有一個女荷官以前在法老王做的，跳樓自殺死了，聽了也心酸。

儘管是爛賭的悲劇一再重演，可還是有荷官願意為此而鋌而走險。過去澳門本地居民較少涉足賭場，2004年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發表了《有關澳門市民對博彩業市場開放認知的民意調查報告》指出，有近六成半的受訪者表示澳門居民對賭博有自制能力，不會成為病態賭徒。然而，隨著賭博娛樂化、拉斯維加斯企業引進開放式的賭場，賭博資訊氾濫，愈來愈多青少年流連運動賭博投注站賭

博。²⁵ 改裝成咖啡廳和酒吧的角子機店也漸漸成為主要的休閒場所。2007年七月一份《中學生參與賭博暨投身博彩業的研究》顯示，有四成受訪學生坦承過去一年曾參與賭博活動，青年染上賭癮或賭博次數逐漸增加，已是不爭的事實。²⁶

對於荷官所代表的嗜賭成性、縱慾揮霍的行為，官方和主流論述往往把之界定成是荷官自身的定力不足所致，換句話說，把博彩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完全看成是個體的「自我控制」的出了問題，純粹是因為荷官的自身的「免疫力」不夠而出現的問題，²⁷ 這也正是新自由主義將社會風險轉嫁到個體的策略的直接體現。從論述建構的過程來看，賭博不再只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被建構成關於病理學的問題，這樣的「賭博範式將過度的博彩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變成了個人的問題，並使之去政治化。這種論述很巧妙地改變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政府鼓勵博彩業的發展，然而將博彩所產生的社會風險卻簡單地歸結為是由於個體自身的「自我克制能力不夠」，或者「風險意識不強」而導致的。可以說個體的自我管理佔據了賭博資本主義這樣的風險社會的中心。

結語

在澳門結束了形式的殖民統治、同時被納入新自由主義資本體系之後，主體的生產邏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以自我管制、自我創造、自我展示與自我愉悅的「自我的技術」在澳門的語境下，激烈地重構了主體的生活方式，成為形塑主體的意義世界和情緒結構的主要方式。在自由擇業、自由選擇的名義下，主體的自主性實際上並沒有脫離政府機器與博彩企業所共同營造的服務與新的權力關係的控制，並根據新的市場的需要而專殊化。新自由主義透過

²⁵ 足球、籃球比賽的賭博則可藉由成年人充當「人頭」下注。許多本地學生以這種方式參與賭博。

²⁶ 2004年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的研究顯示，大學生、非全職學生青年和雙失（失學失業）青年的博彩參與率均超過五成。新青年協會2006年所發布的調查指出，新進博彩從業員入職後，有三成染上賭癮或賭博程度增加。另根據一位曾經在不同賭場工作過、目前在一家新開的美資賭場任高級主管的觀察，她所認識的賭場前線從業員中，十個裡有八個下班後會去其他賭場賭博。

²⁷ <荷官定力不足易差錯>，《澳門日報》，2009/7/24。

鼓吹消費來實現個體的自主性以及由此而帶來「自我解放」的意識形態幻想，將自我承擔風險與代價合法化。荷官的真實境遇實際上反應了新自由主義所凸顯的個體的自我實現與自我管制的內在矛盾。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黃啟臣、鄭煒明，1994,《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

劉世鼎，2007，〈澳門的新殖民主義：透視 2007 年五一大遊行〉，《思想》，第七期。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2007，《博彩業發展新時期澳門青年的價值取向》。

〈澳門賭權將會開放 何厚鏵強調嚴格監管 現況將維持一段時間〉，《大公報》，1999 年 12 月 2 日。

〈青少年服務求新求變〉，《澳門日報》，2008 年 3 月 29 日。

〈外資賭場勁縮皮，荷官慘情〉，《東周刊》，2009 年 6 月 3 日。

〈監管課程免浪費資源〉，《澳門日報》，2009 年 6 月 11 日。

〈勞工局釋在崗培訓聘用計劃〉，《澳門日報》，2009 年 6 月 25 日。

〈勞局在崗培訓助再就業〉，《澳門日報》，2009 年 6 月 28 日。

〈收窄各業差距？新荷官起薪點降至八千〉，《澳門日報》，2009 年 6 月 29 日。

〈賭權開放鑄十年輝煌成就〉，《澳門日報》，2009 年 7 月 15 日。

〈兩爛賭莊荷涉吞六十萬〉，《澳門日報》，2009 年 7 月 24 日。

〈荷官定力不足易差錯〉，《澳門日報》，2009 年 7 月 24 日。

英文部分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yman, A. 2004. *The Disneyization of Society*, London: Sage.

Comaroff, J. and Comaroff, J. L. 2000. "Millennial Capitalism: First Thoughts on a

Second Coming”, *Public Culture* 12 (2): 291-343

Cosgrave, J. F. (ed.). 2006. *The Sociology of Risk and Gambling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Fraser, N. 2003. “From discipline to flexibilization? Reading Foucaul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onstellations* 10 (2): 160-171.

Hardt, M. and Negri, A. 2004.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1990.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undings, 1999, Special Issue on Emotional Labour, Issue 11.

Mansfield, N. 2000. *Subjectivity*, New York: NYU Press.

Read, J. 2009. “A genealogy homo-economicus: Neolibe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Foucault Studies* No. 6: 25-36.

Sennett, R. 2006.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range, S. 1986.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Young, R. J. C. 2001.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Zizek, S. 2001. *On Belief*, London: Routledge.